

摘要

《保险法》第16条中保险人解除合同权脱离合同限制为当事人提供补救措施与必要保障,保险人在出现法定解除原因时可无须投保方同意解除合同,减少合同损失。《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保险人在投保方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下享有的解除权与其他法条中的解除权存有较大差异。虽都有影响合同效力的属性,但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一方面该解除权属于法定的解除权,有别于任意解除权其着重追求维持保险合同关系的平衡稳定,另一方面是该权利适用情形可能与保险欺诈相关联,由此存在较多争议之处,是保险合同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司法实践中保险人适用《保险法》第16条存有诸多不同甚至冲突观点,主要问题集中有:一、法条语言表述不明,法律概念不清导致保险人解除权制度适用混乱;二、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存在争议,有待理清;三、保险人解除权制度法律效果不明确,干扰司法裁判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利益平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一方面对《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进行逻辑解析与重构,分析基本范畴以及其构架不足。另一方面从保险法理论与保险实践出发,通过对解除权行使中存在的问题与争议分析,并结合司法案例以及司法解释提出完善意见。

在《保险法》的第16条规定用语的明确上,结合司法裁判和理论观点加以厘清。具体分为以下两点:第一,《保险法》第16条中“足以影响”的判定须以因果关系说为标准,可以以司法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的三种情形为参照进行认定,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行为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时不应认定为《保险法》第16条中的“足以影响”;第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两种解释并无冲突,符合法律条款逻辑,可并存适用。

在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上,既要解决欺诈可否适用不可抗辩规则问题又要区分故意、重大过失和欺诈。首先,欺诈应当适用不可抗辩规则,遵循秩序价值优先原则以维护成文法稳定与权威性。其次,欺诈属于直接故意,是故意的一种。重大过失虽与故意虽由于现实中主观目的无法直接识别较难确定,但可以将从行为入手分析归纳出的两种情形作为主要标准进行区分。

对于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问题,应当以保险人仅可行使解除权为结论解决纷争。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理论分析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并结合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构成要件重合情况考虑,应当持保险人仅可行使解除权观点,既有深厚理论支撑也符合我国司法主流观点。

关键词: 保险人解除权; 告知义务; 重大过失; 不可抗辩; 撤销权

Abstract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stipulates that the insurer's right to terminate a contract is not limited by the contract, providing remedial measures and necessary guarantees for the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event of a statutory reason for termination, the insurer may terminate the contrac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sured party, thereby reducing contract losses.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surer's right of termination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and the right of termination under other laws in the event that the policyholder violates the obligation of truthful disclosure. Although they all have attributes that affect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tracts, their uniqueness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right to terminate belongs to the statutory right to terminat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arbitrary right to terminate. It focuses on maintaining the bala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insurance contract relationship,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right may be related to insurance fraud. Therefore, there are many controversies and it is a focal point in insurance contract litig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nd even conflicting views on the insurer's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The main problems focus on: First,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unclear, and the legal concept is unclear, leading to confus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er's legal right to terminate; Second, there is a dispute over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er's right to terminate, which needs to be clarified; Third,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insurer's termination right system is unclear, which interferes with the unity of judicial decisions.

In terms of research methods,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search, empirical research, and interest balance analysis are used to analyze and reconstruct the logic of the insurer's right to release under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analyzing the basic categorie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its structure. On the other hand,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insurance law and insurance practi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disputes existing in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to rescind, and combining with judicial cases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Clarify the wording of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by combining judicial judgments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Specifically,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two points: firstly, the determination of "sufficient influence" in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must be based on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theory,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referring to three situations summarized in judicial practice. Failure to fulfill or fully fulfill the obligation to truthfully inform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sufficient influence" in Article 16 of the Insurance Law when there is no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t and the damage result; Secondly, there is no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more than two years from the date of contract establishment",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logic of legal provisions and can be applied simultaneously.

In terms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insurer's statutory termination right, it is necessary to not only address the issue of whether fraud can be subject to the non defense rule, but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intentional, gross negligence, and fraud. Firstly, fraud should be governed by the non defensible rule an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order value priority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authority of written law. Secondly, fraud belongs to direct intent and is a form of intent. Although gross negligence and intent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due to subjective purposes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identified in reality, the two situations summarized from behavioral analysis can be used as the main criteria for distinguishing.

Key words: The insurer's right to terminate; Obligation to inform; Gross negligence; Irrefutable; Revocation right

目 录

绪论	1
一、 《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适用完善必要性	7
（一） 保险人解除权立法梳理	7
（二） 保险人解除权司法困境分析	9
二、 《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司法适用争议问题	12
（一） 保险人解除权法条用语不明	12
（二） 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有争议	14
（三） 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不明	17
三、 《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适用的完善建议	19
（一） 厘清保险人解除权法条概念	19
（二） 明确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	25
（三） 排除保险人撤销权适用	29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5
作者简介	37
致谢	38

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持续了四十多年，经济不断地实现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保险行业飞速发展，步入千家万户，深刻影响着我国人民生活的稳定。在如今经济下行时期，保险业保障意义更加凸显，对个人而言它使人们未来生活有备无患，就社会经济而言它可以分散风险实现社会安全，此外它还是聚集资金促进金融活跃的主要方式，¹与其他行业相比其在近年仍保持稳速增长。保险行业繁荣发展同时也引发诸多保险合同纠纷，银保监会多样举措并行，在监管方面夯实投诉约谈和督查制度建设，做到依法依规执法、维护消费者权益；在推进调解机制多元化方面建立全国性保险业纠纷调解组织，建设完善的保险业纠纷在线调解系统；在风险预警方面，宣传部门联合开展消费者教育和风险提示工作，举措卓有成效，但部分问题最终仍待司法环节加以解决。从银保监会官网公布情况来看，消费者投诉量不断增多，但问题主要集中在保险公司虚假宣传、隐瞒保险期限和未能按时缴纳保费后果等方面。而在这些问题中，投保人履行告知义务与否是诉讼案件的重要交锋点。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告知义务”为关键词搜索，2022年的民事案件达到356057件之多，且该数据近十年呈持续增长趋势。可见我国《保险法》第16条的适用在司法审判中极为普遍与关键，它极大影响保险司法裁判，并愈发不容保险业轻忽，有必要对其持慎之又慎的态度，进行全面、细致、深层次地分析。

欺诈行为既给保险人带来大量沉重且不应有的保险赔付负累，又使保险人通过大数法则精心测定的风险率失去意义，颠覆保险产品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严重破坏了保险合同关系，违背了保险运营的互助共济理念，消解背后投保群体的合法利益。投保人欺诈投保问题可见于我国保险合同全过程，而本文所探究的《保险法》第16条中保险人解除权正是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情形下投保双方利益的调控与分配，是我国立法者基于我国保险司法以及保险市场现实状况制定的规则。其背后隐含公平、合理等价值因素，追求投、保双方利益衡平对等的实现，在法律层面对有着坚实的法理支撑，兼具完整的逻辑理论构架。纵览我国保险学界有关保险人该解除权的研究，多是对于其法理支持、行使原因、行使限制以及法律后果等进行着重分析，我国法学界这类研究上成果斐然。但不可否认的是，不论是期刊论文还是专著针对性研究《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制度的并不多，研究多集中于定义、性质、如实告知义务这一前提等基础理论问题。这类

¹ 参见徐卫东主编：《保险法学》，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文献最为普遍，研究也达到较为深入的程度，拥有完善的理论指导体系。而我国对于涉及司法实践的《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的细分程度不够，微观角度欠缺，导致司法相关研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论指引作用，指导实践的可操作性较差。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长期未变，有关研究多集中于 20 世纪初，目前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许多新问题新状况，有必要审慎观察，且法律不免有缺处、漏处，因此本文对该条存在的一些值得注意的漏洞与问题进行解决。在分析角度上，立法是法律源泉，但法律“流动”至司法环节才开始更深程度地对公民社会生活进行引领、规范和矫正。从立法角度分析规范的利弊固然确有必要，但从司法实证角度深层探析规范的具体作用与局限，把握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效用究竟如何也不可或缺。本文将以前学者的《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制度相关研究为重要的基础与平台，从司法实证研究角度对保险人解除权在实证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给出并证成新的理论路径，以求不仅能够从理论上完善其的内容体系而且能够提供规则满足实践所需。

（二）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将违反告知义务情形下保险人解除权作为论述核心，以解释论优化保险人该解除权行使为主要目标。在《保险法》第 16 条基础上聚焦保险人解除权行使细节问题，从拓展出的司法实证新视角出发，对“足以影响”定义、欺诈可否适用不可抗辩、故意、重大过失与欺诈区分认定、撤销权与解除权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说理，重新梳理保险人解除权行使，将其与告知义务、不可抗辩制度紧密相连，整合出一条顺应立法原意且平等保护投保双方利益的权利行使路径。本文着重对违反告知义务下保险人解除权进行实证研究，从而提炼出司法实践中争议焦点，同时回应学界理论争议，规整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并进行分析总结。综合考量理论支撑和实践需求，从解释论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求指引司法实践，解决司法实践难题，有力促进保险人解除权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贴合，填补保险人解除权研究空白。

2.实践意义

我国《保险法》相关研究起步点相对晚，导致在保险理论、实务方面与保险业发展不同步，导致对《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问题的研究存有欠缺不足。保险人该解除权频频引发合同纠纷，始终没有获得细致明确的解决方案，司法实践中指导思想和理论缺失的状况长期存在，阻碍我国保险行业向更高质量发展。保险人该权利的行使直接影响保险公司利益，间接影响背后投保群体的利益，

它对保险行业的利益分配、秩序维护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研究该问题，不仅能降低保险人解除权行使的难度，更能为保险实务提供更优的解决方案，保障我国司法裁判统一，保证司法实践公信力，维护保险经营的和谐稳定环境。《保险法》第 16 条解除权行使关乎投、保双方利益平衡，直接影响着保险合同效力，其行使机制要立足公正价值观念、平衡合同各方利益。只有明确保险人解除权履行规则，统一保险人解除权司法裁判尺度，才能推动保险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趋于统一，解除保险人解除权存在问题对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的桎梏，使保险的保障安全、共济风险的功能得到最大发挥。

（三）文献综述

保险人法定解除合同是指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当法定的解约条件具备之时，使合同关系归于无效的法律行为。²《保险法》第 16 条中的保险人解除权根源于投保人告知义务，与告知义务相伴相生。自告知义务诞生于英国保险判例后，保险人解除权也逐步入法并不断完善。该条款价值在于维护合同公平、合理的基础，保护危险群体利益、保险业以及社会整体法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原则、公平原则产生的信赖是合同得以订立的基石，《保险法》第 16 条保险人解除权正是对欺诈投保这一破坏信赖行为的惩处。³虽然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该问题研究的重点不同，但三种原则一直贯彻其中指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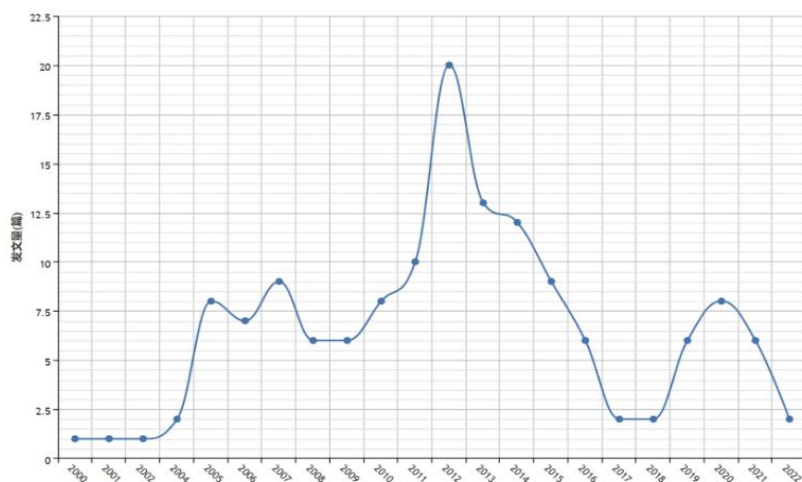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知网以“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为主题的学术期刊数量

我国《保险法》第 16 条解除权的研究萌芽于 1995 年《保险法》出台，随后在 2002 年《保险法》修改后得到重视，在保险学术研究中获得一定热度，在 2009

² 参见傅廷中：《保险法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 页。

³ 参见肖昕：《论投保欺诈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的适用为视角》，载《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21 年第 4 期，第 84 页。

年《保险法》对其作出修订后达到研究的高潮。多年来，围绕该问题的学术研究层出不穷、不断深入，对我国保险人解除权规则的明确具有重要意义。

《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与投保人告知义务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在研究早期阶段，保险人解除权往往被涵盖在告知义务这一论题当中，樊启荣在专著《保险告知义务制度论》中详细地介绍了告知义务发展成保险人解除权的过程以及在其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和存在的问题。⁴贾林青在《保险法》中归纳总结保险合同解除的条件，也对保险人解除权进行论述。⁵虽然《保险法》第16条中保险人解除权的研究曾是保险解除权研究的重点，但可以发现在研究早期我国学者多是以投保人为核心，聚焦其告知义务，随后论述保险人解除权，以保险人解除权为论述话题的延伸，以保险人解除权独立为题的学者较少。

随着研究的深化，学者们注意到保险合同解除权独立研究的必要性，此时涌现出一批专述该问题的文章，着重论述了《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且随着有关该问题的研究框架搭建完毕，学者不再论述保险人解除权概念、性质、行使原因、行使限制、行使效力须考虑主观过错等基本定论的话题，转变重心至解除权与撤销权的关系、因果关系的认定等具体履行细节，并且注重从立法理念、原则角度进行合理性分析。如姜南的《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要素考察》⁶以及杨德齐的《论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的体系建构——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的解除权条款》⁷等等。

1. 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

对于不可抗辩适用范围即其可否适用于欺诈投保问题，主要存在对立的两种观点：一是坚决否定二年期满后不可抗辩存有例外，认为这既是维护合同当事人信赖所需，也是及时督促保险人履行义务的必要手段。⁸二是承认不可抗辩存在例外，目的是扼制投保欺诈现象的频频出现，维护保险业正常秩序。有学者主张按照一般和特别两种程度区分欺诈，特别程度欺诈是不可抗辩规则例外；⁹也有学者认为一般和特别欺诈的区分无法避免主观随意，故不应区分而是同等适用。

10

⁴ 参见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302页。

⁵ 参见贾林青：《保险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157页。

⁶ 参见姜南：《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要素考察》，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10期，第146页。

⁷ 参见杨德齐：《论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的体系建构——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的解除权条款》，载《保险研究》2015年第2期，第91页。

⁸ 参见徐卫东、李泓伟、赵亮：《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刍议》，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4期，第75页。

⁹ 参见梁鹏：《保险人抗辩限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页。

¹⁰ 参见郭建标：《〈保险法〉中不可抗辩条款若干法律问题之探讨》，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1期，第69页。

2. 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

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同时适用说。这种观点主张保险法无法排除民法撤销权适用，两种权利位阶相同故可同时适用。¹¹第二，肯定说即支持撤销权适用。这类学者认为支持撤销权既可以惩治欺诈投保破解实务困境又可以弥补立法不足，¹²也有学者认为保险人可享有撤销权但必须受到一定除斥期间限制。¹³第三，否定撤销权适用。这类观点主张解除权与撤销权之间竞合，保险法处于优先地位。主要根据有这是依据经济价值的自然选择、¹⁴不可抗辩规则不可沦为空谈。

15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的研究成果研究时间较早，缺乏国内实践的结合，重点集中于告知义务制度，对保险人解除权制度单独研究观念不强。且研究高潮距今已有一定距离，新问题新状况频发，有必要重新审视现有保险人解除权体系。这些研究成果中将保险人解除权制度相关内容分析囊括其中，是本文深入研究奠定理论根基。本文着重于通过保险纠纷实证考察，厘清“足以影响”定义、欺诈可否适用不可抗辩、故意、重大过失与欺诈区分、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等等争议问题，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路径进行完整梳理。

（四）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实证研究法、利益平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保险人解除权进行解析与逻辑重构，分析基本范畴以及其深层缺漏，进而提出完善意见。

1. 文献研究法

仔细研读保险学界有关保险人解除权的学术著作、论文、会议发言等资料，对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归纳与整合，奠定理论根基。

2. 实证研究法

通过对保险人解除权的保险合同纠纷进行数据检索、研究与分析，梳理法院裁判文书，总结司法裁判中的主要观点，探究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

¹¹ 参见宫邦友、林海权：《保险法司法解释（二）论证会综述》，载《商事审判指导》2011年第3期，第212页。

¹² 参见孙宏涛：《我国〈保险法〉中不可抗辩条款完善之研究——以〈保险法〉第16条第3款为中心》，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7期，第91页。

¹³ 参见金东辉、李佳栋：《我国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之竞合困局与解决进路》，载《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6期，第58-59页。

¹⁴ 参见陈轩禹：《〈保险法〉中不可抗辩规则的法律适用》，载《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8期，第33页。

¹⁵ 参见于海纯：《保险人撤销权：保险法中的一个制度选择及其合理性追问》，载《中国法学》2020年第4期，第293页。

提出优化建议。

3.利益平衡分析法

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保险合同无处不在，而《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的解除权是该冲突最明显的体现之一，在探析、组构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进路中需要时刻秉持利益平衡理念，一以贯之地分析问题，最终以维持二者之间的利益平衡为导向构建进路，实现法律的实质平等。

4.法解释学研究法

中国法学正处于解释的时代。解释学的最大目标是尽可能减少利益矛盾、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运用解释学对保险法进行解释所采取的方法必须是结合精研法律文本、兼顾社会正义实践的方法。法律的适用离不开解释，保险法实践也依赖于解释学理论，解释学研究法应用于保险法是大势所趋。

（五） 论文结构安排

本文共分为三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介绍《保险法》第16条的立法变迁与司法适用情形，介绍《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的具体情况。第二部分是针对《保险法》第16条司法适用缺漏的实证分析，通过直观观察司法适用细节，整合优化《保险法》第16条适用过程。第三部分是分析司法混乱现状的原因后，从理念、具体实操方面提出总结性优化意见。本文主要着眼于司法争议较多的问题，对于理论实践皆相对定论问题本文并未讨论。

一、《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制度完善必要性

（一）保险人解除权立法梳理

1.《保险法》中关于保险人解除权的规定

立法作为法律研究的根基，是一切学术研究无法脱离的话题。从司法实证角度分析保险人解除权应以理解、厘清《保险法》相关规定为前提。我国保险人在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下的解除权的规定历史久远，从法条变迁挖掘保险人解除权深层内涵是重要的研究视角。

1995年我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以及相关法律后果即保险人解除权，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2002年《保险法》未对1995年《保险法》第16条进行修订，仅根据条文顺序改变将第16条调整为第17条，条文内容不变。

2009年《保险法》并增加了除斥期间，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最终条款顺序又得到还原

仍为第16条规定。

2015年《保险法》修订中，第16条沿袭2009年《保险法》，全部保留，未有改变。

2. 保险人解除权制度立法分析

首先，2015年《保险法》第16条较于2002年《保险法》第17条修改变化是分析的重点，从中可看出我国立法倾向。变化主要有：一、2015年《保险法》保险人说明义务自成一节，直观将二者分开，凸显保险人说明义务重要性的同时，有助二者法律规范更加清晰，便于理解适用；二、2015年《保险法》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由“过失”转变为“重大过失”，文字精准化的背后是对法律概念的理清和更为规范的运用；三、2015年《保险法》将保险人抗辩权时效期间制度纳入，与其他国家的保险法律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是通过调整法律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利益，践行利益衡平理念。2015年《保险法》保险人解除权法条相较于2002年《保险法》的变化背后折射出立法者对投保群体的保护，通过限制一主体权利，导致相对主体义务减轻的立法技术满足保险法平衡投保双方利益的需要。2015年《保险法》第16条一直沿用至今，体现国家为维护投、保双方地位平等而对保险合同本身所进行的控制与干预。

其次，从《保险法》第16条法律条文入手进行精细化分析，可以更加深层次探明《保险法》第16条结构。现行《保险法》第16条共有7款，第1至第3款分别规定了如实告知义务范围、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将引动保险人解除权、解除权行使期限。《保险法》第16条第4款与第5款以区分对待投保人故意、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为原则，主观状态不同保险费是否退还规定也不同。第6款则为不可抗辩条款，第7款则是对保险事故进行定义。第2、4、5款之间的关系值得解析以便适用，目前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适用条件存有两种解释。一是运用目的与体系解释，第4款中“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应符合第2款“足以影响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二是第4款与第5款为分别适用的具体条件，投保人故意违反告知义务，无须满足特定条件保险人即可解除合同，此解释忽视法条整体性这一重要因素，导致第2款消解。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根据结构主义法学的方法观察同一个结构在不同领域中的可能性扩散，是从现象本身去寻找一种内在的关联性，¹⁶应确定第2款为一般性质条款，效力范围涵盖第4款。诚实信用原则贯穿保险法全文，第2款与第4款均遵守该原则，均承担规制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时投保人和保险人平等利益分配关系的任务，二者逻辑具备内在关联，相互协调支撑。这种法条结构既是各个条款的解释内部体系融贯性的需要，也是《保险法》第16条与保险经营原理外部关

¹⁶ 参见沙银华、潘红艳：《中国保险法视域之日本保险精要》，元照出版公司2019年版，第443页。

联性的必然。¹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也对此予以证明，其规定“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16条第4款、第5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¹⁸该解释明确表明《保险法》第16条第4款、第5款中保险人免于承担保险责任与该条第2款关于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直接相关，第4款和第5款以第2款为条件。如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要主张不承担保险责任时，首先需要具备解除权行使要件，其次要在权利期限内实际行使解除权。因此二者无法割裂看待，实际锁定了告知义务与解除权联系，体现《保险法》第16条法条联系的精巧设计。

综上从立法变化以及法条结构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保险人解除权立法规定多集中于投保双方权利义务的整体分配，表述概括性强、较为笼统，导致具体可操作性弱，不利于实践适用。此外此种立法不足还导致司法争议颇多，《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在适用中遭遇困境，切实阻碍了我国保险司法实务公正，也不利于保险业正常经营发展，因此对立法疏漏有必要加以补足，提升立法完善度。

（二） 保险人解除权司法困境分析

1. 保险人解除权司法现状

本文中所要研究的是《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在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下享有的解除权。该解除权与其他解除权存有较大差异，虽都有影响合同效力的属性，但它的特殊性体现在一方面该解除权属于法定的解除权，有别于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着重追求维持保险合同关系的平衡稳定，另一方面是该权适用情形可能与保险欺诈相关联，由此存在较多争议之处，是保险合同诉讼中的焦点问题。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涉及该解除权的裁判文书，自2010年至2021年共有7642例，2010年至2017年共有3628例，而2019年至2021年这3年就有4014例，比2010年至2017年这8年判例还要多出几百例。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情形下保险人解除权适用频率增多，近年来在司法中的适用愈发普遍与广泛。在审判程序上，无论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案件均占据每类案件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司法裁判二审、再审率为72.88%。笔者同时结合消费者投诉情况得出如下结论即《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立法设置不足导致司法困境长期存在，虽保险人解除权行使不一定皆为引发二审、再审的事由，但也可发现保

¹⁷ 参见潘红艳：《〈保险法〉中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条文的结构性解读及完善》，载《法学杂志》2020年第2期，第89页。

¹⁸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18〕14号），第8条。

险人解除权在保险实务中是普遍存在的争议焦点。

2. 保险人解除权司法实务困境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随机抽取近3年200例案例,得到有关保险人解除权案例114件,可见保险人解除权在保险裁判中的重要地位。从胜诉率看,134例案例中,保险人胜诉案件为47件,占35.07%,投保人胜诉案件为87件,占64.83%。可见保险人在三个矛盾焦点中处于下风,胜率差异的悬殊体现了法院倾向以及司法适用面临困境。保险人解除权频频引发裁判纠纷造成司法困境出现有多种原因,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度立法存在不足,投射致司法导致。主要问题为:一、法条语言表述不明,法律概念不清导致制度适用存在混乱不明;二、适用范围存在争议,有待理清;三、保险人解除权制度法律效果不明确,干扰司法裁判统一。

以下为笔者列举的典型案件,体现出上述的焦点问题。

实证考察一:在王玉明与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¹⁹中一审法院认为,在投保时原告投保人在可保资料告知处有关健康问题都勾选为否,满足法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相反二审法院意见为“一审原告住院治疗的主要疾病是子宫腺肌症、高脂血症、糖尿病、肾病等,与其本次所患恶性肿瘤不属于同一病因和部位,不足以认定王玉明未如实告知其原有疾病对本案保险事故发生有严重影响”。可见,“足以影响”这一程度限定性表述含义无法确定直接导致裁判观点冲突,有损司法公信力。

实证考察二:梁瑞珠诉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²⁰中,再审法院以最高法公布典型案例为认定依据,确定《保险法》第16条第3款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的前提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即二年期间限定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间。而在其他案例中多认为条文“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要求的是保险人行使解除权这一起算起点限于二年内。同一条文词汇出现不同解释,二者是否冲突、具体如何适用有待探析。

实证考察三:对于司法实践中不可抗辩规则适用欺诈与否以及其背后根本的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关系问题法院存在矛盾对立意见。不同法院对法律规定理解相异、所坚持价值导向不同导致审判情况各异。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案²¹作为典型分析,尚某从事保险业,其明知自己已患癌症不告知该事实违反告知义务,主观上是故意,客观上是欺诈行为,三级审理法院均认为尚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当适用《合同法》中有关撤销权的规定,支持保险人行使撤销权。此种观

¹⁹ 王玉明诉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豫15民终6832号。

²⁰ 梁瑞珠诉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民申7385号。

²¹ 温太宗诉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豫民再418号。

点的裁判逻辑隐含着欺诈可以作为不可抗辩规则的例外，打破了法律约束。而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杨韵、黄云彩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²²中法院否定保险人撤销权法律根据，认为黄某全部做否定回答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并以同样隐瞒的方式在其他公司投保，主观存在恶意，属于欺诈。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足以救济，如投保人选择适用合同法撤销权，不符合法律规定，故不予支持，实际上坚守了法律规定，捍卫不可抗辩规则的绝对性。

保险合同纠纷自来都是法院难处理、易引发争议的案件类型，是各类商事案件中司法裁判不一现象最突出的一类。原因在于，保险产品顺应时代变化不断更新迭代，而保险立法与司法解释未能加快步伐。保险人依据《保险法》第16条的解除权不能真正做到直接适用，法官经常需要在维护弱势投保群体利益与严格遵守保险法之间进行衡量，难以在个案中化解纠纷，这是导致保险纠纷无法统一裁量的重要因素。实证分析对于保险人解除权研究具有极为特殊且重要的价值。首先，保险法与大量公民的生活紧密结合，是所有金融法律中实践性较强的一种。随着经济蓬勃发展、经营模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巨变，大量保险人解除权司法实践出现，并以迅猛姿态喷发，对有关案例的价值应当愈加重视。只有研究好实证才能做到精准分析保险人解除权制度。其次，保险行业由于订立保险合同中投保双方地位悬殊存在倾向性保护，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样如此。只不过形势彻底扭转，合同订立时占据优势地位的保险人进入司法裁判后变为弱势主体，原因正是法院的强制逆转。我国保险实证中保险人败诉率居高不下更是其直接表现。考虑到实证研究重要价值，有必要对涉及保险人解除权制度案例进行归类、整合、分析。以实证分析作为手段进行研究，将可明晰法官判决背后的保险人解除权制度如何运行、其形成原因以及对公民保险生活的影响。同时，分析法院案件判决理由、判决结果也可更深层次把握保险人解除权规则背后涵盖的理念、精神。

本文基于《保险法》第16条规定以实证研究方法为核心，辅以法哲学角度对其存在问题进行研析，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从法律适用层面分析、理解、解释、重构法律，同时用法哲学补充法条理论根基、探寻合理规则、确保社会正义在该制度履行中得到实现的过程。笔者对问题进行逐次分析，以解释论方法补足立法层面存在的缺漏，以求明晰其适用，改良优化法官裁判路径。

²²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杨韵、黄云彩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民再1544号。

二、《保险法》第16条保险人解除权司法适用争议问题

（一）保险人解除权法条用语不明

1. “足以影响”标准不明确

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18条将“重要情况”含义确定为“影响谨慎的保险人确定保险费或决定是否承保的每一情况”，此做法后被其他国家立法沿用。²³《保险法》第16条第2款“投保人……，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实质就是“重要事实”规则。该规则中“足以影响”这一限定词模糊不清，直接影响着保险人解除权的适用范围和标准。因此，明确“足以影响”含义、正确界定其范围是促进当前司法实务的必要举措，也是理论深化完善的必然之选。

保险实践中，投保人职业、身体健康情况、生活习惯与方式、年龄等等造成影响是否满足“足以影响”标准皆由法院予以衡量判断，自由心证导致裁判观点不一。在黄立中、何伏清等与中国人寿保险益阳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⁴中，黄某某与中国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签订终身寿险保险合同，后黄某某乘坐由他人驾驶的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其子黄立中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以黄某某在投保前有严重的吸毒史且刻意隐瞒足以影响被告保险公司是否承保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法院意见为黄某某因所乘坐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死亡，与其吸毒史不具有关联，保险人不能以被保险人曾有过吸毒史而免责。在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与马海飞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⁵中，苏冰盈向君龙保险公司投保人身意外伤害电子保险，后苏冰盈因蛇咬伤中毒器官功能衰竭导致死亡。保险公司以投保人苏冰盈在投保时未按要求真实填写收入状况为由拒绝给付保险金。法院原审判决认为，苏冰盈对其职业及收入状况确实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况但其与意外事故的发生无关。同样在田丽芳与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⁶中法院认为原告未告知的腔隙性脑梗塞病史对原告后来罹患的甲状腺恶性肿瘤没有影响，故被告长城人寿公司应给付保险金。可以看出，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主要坚持维护弱势投保方利益原则，在不实告知或未告知事项与保险事故发生因果联系较弱或无因果关系时否定保险

²³ 参见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²⁴ 黄立中、何伏清等诉中国人寿保险益阳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湖南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湘0903民初3771号。

²⁵ 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诉马海飞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粤12民终2493号。

²⁶ 田丽芳诉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等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湘0111民初14923号。

公司抗辩，要求其履行合同给付义务。

但是如果法院的这种裁判倾向过度也会导致一些不合理的判决产生，如在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与王倩雯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⁷中，刘静为王倩雯投保水滴家庭综合意外保险，后王倩雯在家中抖床单过程中摔倒，被送至医院诊断为寰枢椎半脱位、齿突小骨、脊髓损伤。亚太保险公司以王倩雯未如实告知其患有齿状突先天发育畸形和真实职业健康状况为由拒绝承担保险赔付并出具了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证明因果关系存在。但法院坚持认为即便个人体质问题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即使存在影响，也不能认定原告存在过错并对本案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存在影响而承担责任。笔者认为法院判决存在不合理之处，因果关系既已证明存在就不能因为保护弱势一方而片面否定责任的承担，违背合理的裁判逻辑，造成公信力受质疑的不良影响。

进一步值得考量的是司法实践遇到诸多新状况与问题。当前医疗水平技术发展进步、细菌病毒的不断进化、社会状态的改变、新的特殊的病症层出不穷加之人类本身存在的个体差异，法院判决不断面临新的相关问题。首先，新的病症不断出现，对于此类新的病症保险人能否实现全面询问？这种新病症所需要的医疗诊断是否要确定标准？且标准要比其他病症确诊标准更规范化吗？这种规范又如何确定？其次，投保人存在特殊期间情况如何处理，如女性投保人孕期出现异常后又恢复健康状态，隐瞒此种病史是否可以认定为“足以影响”？最后，随着现在技术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时检测出一些症状，如许晶与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⁸中投保人具有的胸闷、气短、头晕、乏力等症状虽然是保险合同明确健康告知部分的内容，但难以确定是否由该种症状引发保险事故或者说该种症状是否足以证明疾病早在投保前就已存在。加之医生对此类症状的确诊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判断，所以此类症状在认定因果关系方面也存在困惑之处。这些疑问都与“足以影响”这一修饰限定息息相关，如何寻找正确的理论基础和司法裁判逻辑对其进行解释限定是重要的课题。

2. “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解释不一

《保险法》第16条第3款为不可抗辩条款，对保险人解除权行使期限做出了明确限定，其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两种解释。

在裁判文书网中搜索与《保险法》第16条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

²⁷ 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诉王倩雯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纠纷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鲁06民终470号。

²⁸ 许晶诉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丹东中心支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辽0602民初581号。

近三年有关案例 383 例，筛选后有效案例数量 74 例，其中有 59 份裁判文书认为条文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意指二年截止日期节点为“保险人行使解除权”，有 15 份裁判文书认为“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限定的是保险事故时间范围即保险事故要发生在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之内。两种解释都具备较强的法律效力，具有法理支撑。运用第一种解释的法院认为该种解释是理所当然，并未在裁判理由中对其进行论述。但不难看出其背后的法理支撑是《保险法》属于成文法而成文法律的重要解释方法是体系解释和文义解释。法院认为此种解释是最合理的文义顺延，也是尊重文字逻辑的要求。而运用第二种解释阐释《保险法》第 16 条的法院在裁判文书中的说理部分进行过明确解释。如梁瑞珠与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²⁹中法院指出“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指对自合同成立之日起二年后出现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享有解除权即保险人仅对二年后“新发事故”赔付。陈某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³⁰也直接说明不可抗辩期间只适用于合同成立后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并以以下两点为理由：一是若严格遵守《保险法》第 16 条，将鼓舞恶意骗保行为。二是保险合同具有射幸属性，要求保险事故具有不确定性，但投保事故早在保险合同成立之前发生，此种行为主观目的恶劣，是恶意骗保常见情形，为法律和情理所不容，此时应赋予保险人解除权。且不可抗辩期间只适用于保险合同成立二年后新发生保险事故情形，因此保险事故在保险合同成立前就已经产生的，保险公司无须对投保人进行赔付。最高法以此案为典型意在为类案处理提供经验，以求减少欺诈投保行为，规范保险经营秩序。两种解释同时存在，究竟二者关系为何需要进行释明。

（二） 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有争议

1. 不可抗辩适用范围有争议

《保险法》第 16 条第 3 款规定了不可抗辩规则，但对于保险合同成立超过二年但投保人欺诈投保时不可抗辩规则是否仍限制保险人解除权不仅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观点不一。

在裁判文书网中以“《保险法》第 16 条”、“不可抗辩”为关键词搜索到近三年有关案例 131 例，整理后有效案例数量为 71 例。其中采取否定观点即认为不可抗辩规则不能例外的裁判文书有 59 例，采取支持观点即认为投保人欺诈即便超过二年不可抗辩规则应失效的裁判文书有 8 例，观点不明但倾向于否定不

²⁹ 梁瑞珠诉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粤 13 民终 54 号。

³⁰ 陈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乐民终字第 1079 号。

可抗辩例外判决有4例,可见我国实证已有主流观点,但该问题无明确定论,仍有不少法院存在各异观念。持否定观点的法院主要裁判理由是虽然保险人享有解除权,但解除权行使时间范围受到保险法限定。如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与黄显富、冷京金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³¹中提到超过二年未行使解除权的中意人寿保险公司由于时间期限届满丧失了解除权,法律直接剥夺权利主体即保险公司的解除权,此处的二年为除斥期间,不能中止、中断、延长。该规定并未存在例外情形,故其内涵应当理解为任何情况下解除权均应在二年的期限内行使,保险人不能进行以任何理由为例外抗辩。其理论根据为维护被保险人对自己法律上权利、利益的合理期待。保险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经过一定期间,保险人不得以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合同中存有欺诈、蒙蔽隐瞒、错误陈述行为主张合同无效或拒绝赔付保险金。即便存在欺诈行为,但撤销权人相应的法律实体权利已经随即消灭,原来的法律关系继续有效,此时保险人只能接受解除权丧失的结果,这是与保险人未尽审查义务、错失法律救济途径相对应的。持支持观点法院如李发炎与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³²中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李发炎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其于2019年11月25日手术后被确诊为甲状腺乳头状癌,但其无正当理由迟延至2021年1月28日才申请理赔,致使保险公司无法及时发现李发炎未如实告知的情况,李发炎对此具有过错,相应后果不应由保险公司承担,支持保险公司解除合同。持不明确但倾向于否定观点的法院裁判文书如刘建成与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³³中未明文说明不可抗辩规则不能限制保险人解除权行使,其采取了较为迂回的裁判方法,在保险合同定义上做文章。其将保险合同定义为针对可能发生的事由而订立的合同,是对不确定的风险给予的保障,目的在于谋求经济生活的安定,减少或避免损害,指出《保险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商业保险行为”,³⁴根据保险法定义,保险针对的是未来的可能性,而不是已经发生或未来确定发生、不发生的事由。法院结合保险合同中常见的“首次发病”“首次确诊”条款,将投保人带病投保这一最恶性行为排除。此类法院的裁判根据中还有《保险法》第5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³⁵即用保险法诚实信用原则补充裁判理论依据加强理论支撑。

³¹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中心支公司诉黄显富、冷某某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四川省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川10民终405号。

³² 李发炎诉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健康保险合同纠纷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京0102民初41088号。

³³ 刘建成诉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深福法民一初字第366号。

³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条。

³⁵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条。

关于不可抗辩制度有无例外即其是否可规制投保欺诈问题在司法裁判中观点各异。根本原因在于底层价值、理论根基不同。否定说观点认为不可抗辩规则立法意图在于保护弱势投保群体合理期待,这决定了要以限制保险人解除权为手段才能实现公共利益。肯定说观点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实则就是每一个个案当事人的利益。以司法公正为原则坚持打击投保人等待期满恶意欺诈行为,选择放开保险人解除权限制,允许其解除合同是正当之举。肯定说虽然保障、实现了个案的公平正义但违背了法律明文规定,损害法律秩序,不利于投保群体、保险人长远利益,社会效果也较差。

2.故意、重大过失、欺诈易混

故意、重大过失、欺诈直接限定保险人解除权适用范围。《保险法》第16条第2款明确了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形为故意和重大过失两种。对比研究可知,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将投保人的过错情形分为故意隐匿、过失遗漏和不实之说明,³⁶日本商法典“……因故意或重大过失,不告知重要事实……保险人可以解除契约”规定将违反告知义务情形归类为故意、重大过失。³⁷英美保险法则是对于违反告知义务归纳为:违反保证、虚假陈述和隐瞒三种。³⁸我国将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过错限定为这两种的原因是不同于他国,我国更加突出投保人权益的法律保护,因此对于故意、重大过失的概念界定是保护投保人权益的重要一环。

《保险法》第16条第4、5款的规定则是对于投保人两种不同过错的不同处理方式,因而发生不同法律后果。因而区分故意和重大过失以及将这种区分标准应用于保险实践对保险人解除权制度、保证保险合同利益得到公平地维护具有重大意义。

对于欺诈,目前我国司法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法院观点为一旦投保人不实告知,就构成欺诈投保,不存在例外情况。这种认定不当扩大欺诈投保范围,使行为恶性未达到欺诈标准的告知瑕疵一类也成为欺诈,使保险人享受过多利益保护。³⁹第二种法院以投保人将风险已经发生的事实投保背离保险本质为由,只承认投保前风险已经发生的投保为欺诈投保。⁴⁰司法中的混乱要求统一法律理论的指引。第三种法院以因果关系说为判断标准,如不实告知事实与保险事故具有直接因果关系即构成欺诈,如聂玲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人保险合同纠纷一案⁴¹中以“投保人所患脑梗塞可导致神经系统永久性功能障碍发

³⁶ 台湾地区“保险法”受英美法系影响将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形态根据客观情形区分。

³⁷ 参见《日本商法典》,王书江、殷建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页。

³⁸ 参见樊启荣:《保险契约告知义务制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页。

³⁹ 朱思怡诉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吉0104民初5441号。

⁴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陈建平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福建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闽02民终1766号。

⁴¹ 聂玲诉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周口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河南省扶沟县人民法院民事判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98102041035006042>